

· 金盾系列丛书 ·



政法风云录

徐雅雅 著

学苑出版社



• 金盾系列丛书 •

政法风云录

徐雅雅 著

学苑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沈兆平

封面设计：张 安

插 图：李鸿飞

政法风云录

徐雅雅 著

学苑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四颁赏胡同四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水电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75 插图：11幅 字数：150千字

印数：1-35000

1990年12月第1版

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ISBN7-5077-243-X/G·212

定价：3.00 元

出版者的话

稳定是压倒一切的。这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要求，也是人民生活安宁幸福的要求。但是，如同一切良好愿望一样，要使之变为现实，还必须努力消除阻碍它实现的障碍。

违法犯罪活动，无疑是中国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。凡是主张中国社会稳定者，无不主张严厉打击之。

这就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：

当代中国社会中主要有哪些违法犯罪活动？

它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？

它们有些什么新特点？

它们采取什么新形式？

它们的分布、流播情况如何？

它们采用什么样的欺骗手法、作案手段？

它们的危害到了什么程度？

.....

不了解这些，善良的人们不说不能与之斗争，甚至一不小心，就会掉进它们设置的圈套、陷阱里。

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，我们推出了这套《金盾系列丛书》。本丛书不仅仅是对光荣的公安干警的赞颂，也是为了

提高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新形势下违法犯罪活动的识别能力。

既然本丛书旨在起到这样一种宣传教育作用，那么“纪实性”理当成为本书的第一特色。所以，我们约请的作者，都是政法界的文学工作者，丛书披露的，也都是真人真事，只在必要的地方作了“姑隐其名”的处理。

愿本丛书成为你知法、守法和用法的益友。

学苑出版社
1990年11月

堅決掃除六害
建設精神文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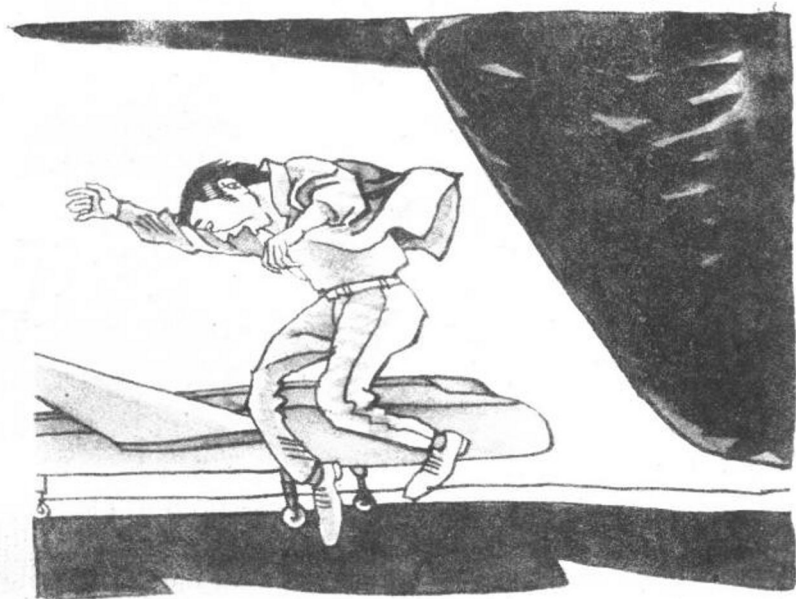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九零年九月

俞雷



目 录

劫机犯张振海引渡纪实	(1)
震动全国的前门地铁惨案	(15)
“007”在拉萨	(31)
一“炮”惊两省	(89)
扑朔迷离五十天	(117)
银行劫匪落网记	(127)
“联动”真相	(147)
女“法利亚长老”的奉献	(165)
天 平	(176)
“青铜骑士”自白	(188)
“通天”寻子记	(197)



劫机犯张振海引渡纪实

“在从日本警察手里接过轮椅的一瞬间，”何亭说着，把本来笔直的腰杆又挺了挺，微微一笑道，“张振海就归我们管了。”

这位公安部刑事侦察局青年警官的笑也感染了我。

上篇 劫 机

萧悦是个 24 岁的秀气姑娘，作为一名外贸干部，深知

在商战中“一刻千金”的道理。飞机飞了一个多小时后，她觉得差不多该到上海了，于是抬手理了理头发，又整了整衣服——下了飞机马上就得投入工作。

可是飞机并没有降落的意思，却很明显地保持着原有的高度。更令她吃惊的是机窗外出现了外国军用飞机，不祥的预感攫住了她，心跳顿时加快了，一个可怕的字眼一下子进现在脑海：死。

这时，一个空中小姐快步走过她的身边，她伸手扯住空中小姐的衣服，低声而急促地问：“飞机怎么啦？”“对不起，现在不能回答你。”空中小姐虽然微笑着回答，但眼神却流露出一些紧张。

那么柔和，使得萧悦不好再问下去。然而，……心里更加怕了，腿也软了，气也短了，眼也直了……

40多分钟前，一件出人意外的不幸事件就已经发生了。这正是载着223人自北京经上海飞往美国旧金山，最终抵达纽约的CA981航班飞机从北京起飞的20分钟后。

以下是男乘务员大伟事后对中国警官的叙述——

“起飞20分钟后，女乘务员晓兰走到我身边小声说有人要劫飞机。我马上和晓兰到机组休息室，把情况告诉了机长，机长只有一句话‘稳住他’，说着走进驾驶室，发出‘遇劫信号’。我按晓兰的指点来到了C舱，见K座上坐着一个男子，J座上坐着一个男孩，旁边坐着一个妇女。这男的戴了一顶鸭舌帽，脸色较黑，看样子是个农民。我走过去，那人用警惕的眼光看着我，我就把双手举起来，手心向着他，这是表示和平的手势，然后向他一步步走去。我看见他左手放在腿上，眼睛一斜一斜地看着表带上的指南针，右手插在前襟里面。我先对他讲：‘我是受机长委托同你谈谈，你

是不是要去南朝鲜?’他说:‘我要去南朝鲜!’显得十分激动的样子,‘我带了300克TNT炸药,我搞过上百次试验,是自己研制的,100克就能炸断铁轨,我一共带了300克,我们全家都来了,不想活了,你要是骗我,就是到了地面,也能把飞机炸掉……’”

如同一千面大锣同时在大伟耳边敲响,他感到五脏六腑都被揪在了一起。

“鸭舌帽”那插在胸襟里的右手,时而露出牵着的一段线绳,仿佛随时都准备拉响爆炸装置似的,那时,“鸭舌帽”将变成一颗大“炸弹”,带着呼啸,把全飞机的人的血肉抛撒天空……

萧悦一直冷汗涔涔,死神仿佛就在耳畔一个接一个地打喷嚏。

紧张的空气已经在机舱里弥漫开来。

“鸭舌帽”也看见了标有南朝鲜标志的战斗机了,眉结一跳,松开了。

又飞行了一段时间,大伟走到“鸭舌帽”那里,十分客气地说:“飞机马上就要降落南朝鲜了,你们三位请先下飞机,从后门走,其他乘客就不动了。”

“鸭舌帽”被大伟的毕恭毕敬迷惑了,他顺着大伟的手指向后门看了一眼,矜持地向后一靠,不再言语。

“大鸟”展着双翅,降落停稳了,——终于停稳了。

这里并不是南朝鲜,这一点只有机组人员明白。因为南朝鲜金浦机场不允许飞机降落,而飞机油料又不够,只得请求在日本福岡机场紧急降落。

大伟礼貌地对“鸭舌帽”说:“到了,请下飞机。”

“鸭舌帽”起身，右手却依然插在衣襟里。

所有的旅客都瞪大了双目，注视着“鸭舌帽”的一举手一投足——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！

大伟熟练地打开 R₄ 门，朝外看了一眼，回头侧身，说：“你看。”

“鸭舌帽”伸出脑袋便往外张望。

——突然，他意识到什么，猛回头，满面狰狞，那只罪恶的右手仿佛就要向外抽动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大伟一个“闪电反应”，……“鸭舌帽”连同它的主人一齐从机舱门坠落下去……

薛机长马上命令飞机向前滑行，以避免劫机者突然丧心病狂的引爆，造成人员伤亡。

大伟站在机舱口，注视着跌落在跑道上的那个男人，远了，渐渐地远了。

“真是一场噩梦啊！”他狂跳的心久久不能平静……这一天，是 1989 年 12 月 16 日。

“鸭舌帽”重重地摔在跑道上。

如同一截木头撞击了大钟，与钟声有所不同的是发出的声音是“杂音”。

被劫持的中国民航 CA981 航班—2448 号飞机于翌日凌晨返抵北京，“鸭舌帽”身边的女人和孩子也随机返回。

那么，这个躺在担架上的“鸭舌帽”究竟是谁呢？

他叫张振海，又名张营，1954 年 1 月 10 日生，是河北邯郸丛台区四季青乡农民，1987—1988 年承包四季青村办棉机厂，任副厂长。他有贪污犯罪行为，1989 年 10 月 11 日被丛台区人民检察院逮捕，由于认罪态度较好，又主动退

脏，同年11月6日取保候审。

在劫机事件发生24天后，他写了一个字条：

“我要政治必难。”

1990年1月9日 张振海”

这个张振海，把“避难”写成“必难”，仿佛在无意中为自己写下了“谶语”，事情的发展恰恰应验了他“必”而不“避”，不过在当时，这纸条确实成为某些人“挥舞”一时的“武器”。

最为此举狂喜的莫过于流亡海外的“民阵”的先生们，他们的代表于1989年12月20日对日本的新闻媒介说：“我们对张振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，采取这么一种劫机的方式逃出国外，表示一种同情。”

某些港台报纸也宣扬：“如果不是镇压，张振海没有必要出此下策，‘狗急跳墙’而做出这种违反国际法的事。”

那么，张振海是如何“万不得已”的呢？是如何“狗急跳墙”的呢？

据张振海说是因为参加了“民运”而遭受迫害，所谓“民主中国阵线”的巴黎总部也“声明”：“对1989年12月16日张振海劫持民航飞机，使无辜旅客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犯罪行为，表示遗憾。”但是，“民阵”认为日本政府及司法部门“应考虑到张振海劫机案的政治性质和历史背景。”

“民阵”先生们如是说，似乎张振海是个参与“六四”北京政治风波的“积极分子”，他的劫机行为是应当得到原谅的。

可以想象他落地时动弹不得的狼狈样及所谓“历史背景”会引起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的同情，也可以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一些抱着“决不能蛮不讲理或愚昧无知地要求一个人去爱把他变成非人的祖国”观点的没有灵魂的中国人，在日本街头散发支持张振海的宣传品，更可以听到自巴黎翩翩而至的原

“北京王自联”头目岳武以及他口若悬河的鼓噪。

事实的真相，如同大江中的磐石，虽为浪花、泡沫围裹着，但仍是客观实在。

中篇 真 相

1989年12月18日下午。张振海的妻子在日本福岡机场就写下“本人要求回中国，越快越好”的声明，她随CA981航班回到中国后，接受了警方的询问。

这位35岁的农家妇女，初中文化，长相平平但口齿伶俐。

警方人士温和地说道：“今天我向你了解你丈夫张振海的有关情况。根据我国《刑事诉讼法》第三十七条、第六十八条规定：每个中国公民都有做证的义务，应当如实提供证据、证言，做伪证或隐匿罪证，要负法律责任。你听明白了吗？”

张妻答：“我听明白了。”

“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，在此期间他到过北京吗？”

张妻答得很干脆：“在此期间他没有到过北京，当时张振海正在结算承包棉机厂期间的经济账目。”

“1989年6月1日至4日张振海在哪里？”

张妻答：“那时他就呆在家里。当时正好是让他清理经济账目，国内发生动乱暴乱就把结算经济账目的事给耽搁了。公安局对这件事顾不过来，所以那些天张振海一直呆在家里听广播、看电视。”

妻子是这样说的，再看看乡亲们是如何说的。

在邯郸市公安局的调查报告上是这样写的：

“关于张振海自称1989年6月初在北京反革命暴乱期间

‘烧军车’情况，据四季青村委会证实：1989年3—8月期间，张确实在家居住，没有外出。不少村民也证明，在此期间在村里经常见张，没有发现外出。”

既然没有到北京，也就谈不上有过“烧军车”的“壮举”。

张振海究竟是为什么要劫机，又是怎样准备的呢？

显然是因为逃避“经济账目”所带来的麻烦，他“狗急跳墙”。

张妻告诉警方：“今年（指1989年）11月底的一天，张振海对我讲：‘咱们坐飞机到外国去吧。’我问他：‘怎么去外国？’他说：‘我配点炸药，想办法劫架飞机到外国。’”

警方问：“张振海配过炸药没有？”

张妻答：“他具体怎么配制炸药我不清楚，我只是在家里见他实验过。”

“这次你们上飞机时，张到底带没带炸药？”

“我跟丈夫12月14日从邯郸家出来时，见他把装炸药的布袋子捆在腰上，晚上睡觉时他都不摘下来，我没有看见他摘下来过。”

公安人员从张振海家里组合柜内提取了爆炸物4件，北京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检验报告证实：1、2、3号检材其成分为 KCO_3 、S、O，系黑火药；4号检材，其成分为 $KClO_3$ 、S、AL，为闪光火药。

12月16日，日本警方并未从张振海身上搜出炸药，他为什么临上飞机又把炸药扔掉呢？事后，张供认：由于实验几次效果不理想，干脆学着诸葛亮唱个“空城计”，扬言身上有炸药，威胁机组人员。

大量的证据提供给了日本有关当局，按照日本的法律规定，将对张振海劫机事件公开进行审理。于是，围绕着审判

与引渡，有人上演了一场举世瞩目的闹剧。

1990年4月2日，日本东京高院第二次开庭，由律师团和检察方面对张振海进行讯问。张振海在两个多小时的庭讯答对中，振振有词，把自己如何参与“西单民主墙”和天安门反革命暴乱说得有鼻子有眼，一会儿在北京市地图上指出地点，一会儿捋胳膊挽袖子，让法官看自己身上所谓“铸伤”，还蛊惑人心地说：“实际上我冒最大危险实行的是和平劫机，只是欺骗机上人员说我有炸药。”

“说我出国是为了找工作，这是笑话。我在中国生活相当富裕，存款还有2万多元，我还到国外找什么工作？”

言下之意，还是要把自己说成是政治“必难”。

中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公开揭露张振海的丑恶嘴脸以正视听。

3月30日，中央电视台记者连夜赴邯郸对张妻进行了电视采访。

在张家的东房里，张妻搂着10岁的儿子坐在沙发上，从容地回答着记者的提问，再一次证实了1989年4、5、6月发生动乱暴乱时，张振海没有去过北京，6月3、4日他仍在家里看电视，而邯郸发生学潮时，张振海也没有参与，这期间他在家为打经济官司的事而写材料。

颇值得玩味的是记者对张振海儿子的一句问话。

“你是和你爸爸在一起看电视知道北京发生反革命暴乱的吗？”

孩子回答：“我们全家都在看电视。”

老婆、孩子在邯郸实话实说。

为夫为父者却在东京漫天撒谎。

4月1日，中央电视台的录像带送到日本。

此后，日本一家电视台三次播放了张妻答记者问，这无疑对张犯的谎言是个“底儿掉”。故此，当“日本决定递解张犯出境……日本国内反应则认为法务省的此项决定合理”（据法新社东京4月23日电）。

真相已明，可有人仍坚持谎言。

那便是岳武。岳某人西服革履，头顶反动组织“民主中国阵线”的“监事”官衔，在4月4日的第三审法庭上，终于从后台走到前台，以证人的身份出庭，把“撒谎术”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岳武。”

“你在中国被通缉，是因为什么罪名？”

“我是阳泉市的一个厂长，中国警方通缉我是因为我参加了中国的民主运动。”

“去年6月你见过张振海吗？”

“见过。我见过三次。”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在北京，天安门广场西侧观礼台。当时我问，你从哪里来，他说从河北邯郸来。由于我很关心外地的情况，就问：‘邯郸的情况如何？’张把邯郸的情况讲了，谈了15分钟。我问张来北京的目的是什么，张说他要参加工人运动。”

在东京法庭作伪证之前，岳武3月20日在巴黎接受日本电视节目采访时已有过一番“精采”的预演，当时的谎言编得还不够圆满，这里不妨对比一下：

“1989年5月29日，我从位于天安门广场的‘工自联’事务所出来时碰到张振海，张说找负责人，我说我就是负责

人，张就告诉我说邯郸仍在游行，张胳膊上戴着工人纠察队的袖章。”

还需要指出的是，在这个谎言里还套着另一个谎言，那就是自5月18日深夜，岳武自报公议地当上北京“工自联”副总指挥的108个小时后，即5月23日下午，“工自联”的其他几个头头因嫌岳武的野心太大，而在“中外记者招待会”上宣布免去他的“职务”，可他居然在“5月29日”对“张振海”仍说“我就是负责人”！

骗中骗，谎中谎，且做得如此堂而皇之，只有丧失国格人格的人才干得出！

做完伪证之后，岳武“不辱使命”地返回巴黎向“民阵总部”复命去了，在成田机场的候机大厅里，但见他那夹着香烟的左手胡挥乱舞，口水四溅地喋喋道：

“作为我本人和张先生是一样的，都同时参加了北京天安门广场运动，张先生所采取的方式无非是个劫机的方式，……”

好一个“无非是个劫机的方式”，在岳武之流看来，一架飞机算什么？几百个乘客的性命算什么？国又算什么？家又算什么？个人的目的高于一切！这些“人权卫士”只注重以自己个人为本位的人权，而最忌讳谈基本人权——集体人权。忌讳道出他们关心人权的真正用意。

让我们剥开“人权卫士”岳武的外衣来看看：

岳武，生于1947年，河北雄县人。初中文化，1964年参加工作。

1966年从鞍山调到阳泉铝矾土矿时，正赶“文革”初期，时年不足20岁便造起反来，成为矿上一派群众组织小头目。从此，他官欲萌动，野心勃发，不择手段地苦心经